

玉渊杂谭

以疏代堵是解决“刻字”之道吗？

文·杨雪

貌似从记事那会儿开始,家长和老师在公共场合进行文明行为教育的时候,就已经把抵制“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陋习列为重要的一条。没想到时隔二十几年,在四川竹海景区,居然出现专为游客设立的“刻字纪念馆”,供手痒的游客刻字留念。据说这片竹林以生命力旺盛的楠竹为主,游客在表层刻字,不会对楠竹生长带来不良影响。近几年,每逢四川竹海旅游高峰期,平均一天就有约10根竹子因被游客刻字而“受伤”。现在景区围出这片“竹坚强”

来应对来势汹汹的“刀客”,看起来是“有病就有药”之举,实则属于“杀一而救百”,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且抛开动植物伦理,不谈公平和牺牲,此药看来也只是麻醉剂,不仅良方正药。记得前两年国内外都闹得影响挺大的中国少年在埃及卢克索神庙浮雕上刻字事件,当时有人针对“刻字是国人的劣根性”进行反驳,也掀起了一系列外国人在世界各地景区刻字的证据。事实上,此陋习确实普遍存在于世,但必须承认的是,中国人确实

更钟情于这种简单粗暴的留名方式。说起来可能要追溯到齐天大圣——这不知深浅的泼猴在佛祖手指上写下“到此一游”。当然这是一句调侃,不过将现代人的刻字陋习溯源到甲骨文、铭文,乃至历代王侯将相文人骚客留下的碑文,我以为欠妥。古人的留字基于文学和艺术价值,传世而愈显珍贵;今人的刻名尽是些歪歪扭扭的笔画,是基于满足个人私欲的妄为。也许二者同属留名于世的心理需求,但性质却大相径庭。实际上,现代人在景区刻字很大程度

上是一种“刷存在感”的表现,所谓“中国式刻字”低素质的背后,折射出缺乏存在感、价值感,自我认同度低的心理困境。在一个从小被要求“服从”的环境下,个体长期被剥夺自我、压抑个性,很难形成独立的人格。与其说在不属于自己的物品上留名是一种占有欲,倒不如说在公众能看得见的地方留名,才好证明自己存在。此外,还多少要和“少见多怪”扯上一些关联。那些游历八方、见多识广的人基本上不需要以刻字的方式证明自己来过(有

此癖好者除外)。这和景点拍照心理相似:资深驴友大多只拍沿途风景,而像《泰囧》里宝宝这样的人物,则需要从各个角度举着“剪刀手”,证明自己到此一游。再说四川竹海景区以疏代堵的“软保护”方式。如果社会心理和经济基础不发生结构性改变,文明进程就得不到提升,那片遭受命运不公待遇的楠竹很可能白白牺牲,因为在“刻字纪念馆”之外的竹林里留名,才更能凸显自己的个性,更能“刷”出一种高于世人的存在。

纯文学 离我们有多远

文·陈莹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对“诗和远方”的向往,恰证明了诗和情怀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在洒满朝霞的清晨读一首诗,在周末的午后躺在沙发里看一部令人快意的小诗,在夜雨霏霏时趴在暖暖的被窝里读一段措辞典雅精妙的散文,在不经意中被某段情节、某个人物、某句话甚至某个词瞬间戳中而心怀激荡……这是多久以前的体验?

看到日前发布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结果,平日里自诩为“文学爱好者”的我不禁汗颜——除了《江南三部曲》和《黄雀记》,其他三部作品我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详”。即使是在“汇集一亿文艺青年”的豆瓣社群,这些获得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最高奖项”的作品页面也显得寥落而冷清,点读人数和评论人数都仅仅停留在千位甚至百位,慕名而来,翻开书册读不到百页就半途而废者亦不在少数。

于这个流年电转的时代,过快的生活节奏、过大的工作压力使文学成了与生存无关的“身外之物”,我们读书,在很大程度上已非兴趣使然,而是出于种种功利目的,当然也就无从体会阅读的快乐。地铁上偶有人捧读书本,看的也多半是英语教材、资格考试、经管、股票或励志类读物,人们已经很少驻足脚步静定内心,花时间去读一读“无用”的诗歌和小说。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崛起造成了信息资源的爆炸,网络信息的超载和搜索技术的超速使未经筛选的信息大量涌入人们的视野,我们看微博、读微信,订制电子杂志、购买电子书,随时随地能够开启、终止的各种碎片化的“段子”,和以轻松、娱乐为目的的网络文学渐渐取代了主题严肃、注重思想深度的大部头纯文学作品,占据了我们的零散的阅读时间。不知不觉间,纯文学的经典作品成了珠穆朗玛峰顶缥缈的云彩,令人心存敬畏,却离我们生活的世界那样遥远,那样陌生。

恩格斯在评论《人间喜剧》时说:“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纯文学的本质正是剔除社会功利和精神的表象层面,用文学书写的方式不断探索、挖掘人性之根的终极关怀。林语堂先生将阅读的意义提升至塑造人格和启沃智慧的层面:“读书,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长见识,养性灵。”较之碎片化、浅层化、市场化的作品,纯文学的阅读过程更能激发思想行为的反省与批评理性。较之对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不经选择地盲目吸纳,阅读严肃的纯文学作品则是一种“原创性”的阅读,经过作者审慎思考的厚重文本能驱动我们去思考人生、锻炼智慧,以思想的共鸣触发灵感的火花。当然,这种思考的“原创”并不一定是纯粹理性的思辨,审美愉悦和情感共鸣,以及由此生发的感性体验,也是一种“原创性”的精神生活。纯粹的文学,它并非空气土壤,却如阳光雨露,同样不可或缺,还带给人美的愉悦。

周作人先生在《生活之艺术》中写道:“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单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在平淡生活里,更多的时候我们无法背起行囊去寻找远方,徜徉在纯粹的文学世界里,或许我们的思绪也会不自觉地飞向比远方还远的地方——那里阳光正好,花朵无数,游鱼慢行,一掠而过。

随想随录

刘慈欣:一位跑完马拉松全程的中国科幻作家

文·郑军

刘慈欣能拿下雨果奖,我没觉得多意外,毕竟作品水平摆在那里。意外的是刘慈欣成为第一个拿下世界科幻大奖的亚洲作家。媒体还在不停地挖掘此事的象征意义。我想说的是,努力、坚持和天赋一样重要。刘慈欣能有今天,是因为他坚持跑完了一个作家的事业全程。1998年我从《科幻世界》杂志社辞职回天津,后面有段时间经常给姚海军去电话,了解业内动态。记得1999年春季的某天,姚海军很兴奋地在电话里说,他们发现了一个新作者,“很有可能是下一个王晋康”。这是他的原话,这个新作者就是刘慈欣。天津新蕾出版社的史志成老师当时

也在组长篇科幻丛书,手里拿着刘慈欣的《球形闪电》,后来因故没出版。那些年,王晋康被公认为中国科幻第一人,把连处女作都没发表过的新人评价得这样高,显然他有惊人的才气。过几个月我才看到《三体》《地火》这些刘慈欣最早面世的作品,知道姚海军和史志成作为专业的科幻编辑都没看走眼。然而除了王晋康外,那些年红极一时的还有另外几位青年作家。他们都比刘慈欣年纪小,出道却早好几年。刘慈欣埋头创作十几年,才在1999年发表处女作。而那几位作者基本上投稿就能发表。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时,各社编辑就围着那几

个年轻人转,每个人都得应付一批约稿。然后呢,有的人完全自我放弃,沉匿于网络游戏。有的人去建筑行业经商,发了大财。别人的职业选择我不评价,毕竟人家在商界也是成功的。但如果他坚持写科幻到今天,可能有条件成为又一个刘慈欣。还有的人没离开文艺圈,但跑去写剧本(非科幻),写童书,因为当年科幻市场还养活不了职业作者,那样有收入就先干哪样。这些老朋友因为在科幻创作道路上没坚持到最后,就不提名字了。在这里只提其中一位:当年论才气和勤奋都不亚于刘慈欣的柳文扬,因不可抗力没跑完这个马拉松。如果说刘慈欣花了三十年,跑完了一个职业

作家的马拉松,那些更早成名并且更年轻的人,只跑到十公里,五公里,甚至更短。所以,每当有人让我评价今天的年轻科幻作者,我总是说,等他发表处女作十年后,如果还在坚持创作,咱们再评价吧,毕竟世界的诱惑太多了。当然,今天他们有刘慈欣作榜样,坚持下去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刘慈欣这次获奖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证明了主流文学和科幻文学完全是两个圈子。全世界主流文学作家是一个圈子,全世界科幻作家构成另一个圈子。科幻人欣赏科幻人,而不管国籍是什么。以前就有人问我:刘慈欣能不能拿茅盾文学奖?我说他就是拿了雨果奖,都不

写在书边

月光的思念

文·吴岩

金涛,中国科幻文学史中的传奇人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以科幻处女作《月光岛》打破了新中国科幻文坛对社会生活表述方面的持久沉默,把“恶托邦”故事带入了中国科幻的版图。在小说中凸显的极左思潮,断送了两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却也激发了从读者更高层次观察自身的渴求。如果说刘慈欣的小说《三体》系列让人从宇宙的高度观察人生,那他的小说在中国的科幻土壤中,则有足够的文本渊源。跟魏雅华、童恩正、郑文光、叶永烈等一样,其作品奠定了今天中国科幻反思现实的内容基础。故事中的“月光岛”,既是一个地球文明跟外星文明交汇的地方,又可被看成是现实和未来的交叉点。这是我第一次从金涛小说中领略月光的象征意义。现在,30多年过去了,当我再度拿到金涛新著《月光曲》(《儿童文学》2015年7、8、9期连载)的时候,我的期待也油然而生。这是一本关于《月光岛》的续集吗?那个远走他乡躲避极左思潮的女孩孟薇是否回到了地球?抑或,她已经在另一个星球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我的猜测大错特错了。这是一个跟《月光岛》彻底不同的故事。在小说《月光曲》中,政治发展的主题已经被放置到了一边,一个富足的全新时代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个科技进步、中国人的梦想得到充分满足的时代,主人公会有怎样的遭遇呢?如果你是金涛的老读者,便能获知他的创作范围其实非常广泛,除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小说,他还写过以科技进步为主题,对科技进步中人类生活应该怎样适应的内容进行全面书写的作品。我觉得《月光曲》应该属于这一类创作。而一旦你把他他的作品放入这类作品范畴进行考察,另一组熟悉的金涛模式便呈现在眼前。通常,字里行间,一个侦探格局逐渐显露,而情节丝丝入扣的发展,把你的注意力深深地引向作者的谜团。我觉得《月光曲》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展现。首先,采用简朴的文字展现神奇的科技,是金涛科幻小说自始至终没有变过的追求。而《月光曲》恰恰让我们回到了金涛式的日常生活。你能感受到那种从办公室到家庭的世界,能感受到他给出的那座城

市的大街小巷。用简朴文字勾勒场景的好处,在于可以立刻把读者带入其中,真实的一切包裹着你。但恰在这样的日常真实里,惊天动地的事情正在发生。其次,金涛科幻小说中的人物选择,常常能跟他生活中所经历的两个职业有着显著的关联。金涛在大学教过书,当过新闻记者,还是一位重要的出版人。也恰恰是在这些工作生涯中,他最会选择最喜欢或印象最深的人物来描写。金涛的小说中最容易看到公安人员和科技工作者,这跟他所从事的教科文卫领域的新闻有关。接下来,金涛的小说还特别喜欢写各类蓝领。我觉得这跟金涛广交朋友有关。他为人谦和,总是能跟各种人打成一片。这样的态度,让所有人乐意跟他打开心扉。不过,《月光曲》还有一些在金涛科幻中不是特别常见的人物关系,这就是校园生活和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但他写的不单单是孩子,更是强烈的社会互动中的孩子。这些一方面来自他的观察,更来自他的体验。第三,这篇科幻小说特别注重发挥科幻小说的特色,即把科技、想象力和神秘现象的破解放在了首要地位。在过去的30年里,由金涛、魏雅华等开创的这个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确实聚集了大量科幻作家关注的目光,但是,这不可能是唯一一条科幻的行走路径。我觉得金涛是那种要不断变换自己尝试方向的作者。科幻的根到底是什么?如何真正让科幻的功能有所发挥?这可能是《月光曲》这篇小说主要聚焦于航天和太空科技的原因。在小说中,中国的航天技术已经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而常驻月球,以月球为基地走向更加遥远的深空,已经是人类进行的新的生存探索。然而,在精深地展现科幻魅力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今天少年儿童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众多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物我观都已经泛滥于孩子们的生活,而且常常会占据主流的地位。我在从事科幻教学和日常跟青少年的接触中,就常常能发现这一点。在这样的时代,怎样能打通他们的思想,跟他们真正做到沟通与交流,也成了我们这些年龄较大的作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我觉得对自己创作的一个重大前提。期待在未来的作品中,能看到这些思考的结果。

艺苑



天山深处有人家(摄影)

李晓楠

《三体》:站在科幻文学的浪尖上

文·杨富波

我读《三体》是在2009年,可谓佩服得肝脑涂地。彼时,第三部尚未问世。而今,大刘获雨果奖,几乎被媒体“锁定”,看到如此之多的好评,我也忍不住想谈些什么,就从腾讯专栏作家李淼的一篇文章谈起吧。李淼在8月25日的专栏中提出《三体》是“我们时代的新经典”。封《三体》为较大的作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我觉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新的思考,是金涛重开自己创作的一个重大前提。期待在未来的作品中,能看到这些思考的结果。

西方伟大作品抗衡;同样,《三体》虽然杰出,也未担当得起人民需要的“新神话”之重任。其实,《三体》和《红楼梦》可比性不是很大,虽然二者皆为小说,然其区别实不亚于熊猫之于波斯猫。粗暴一点说,《红楼梦》是“雅文学”,《三体》是“俗文学”(雅、俗只是分类,无高下之意)。《红楼梦》是雅文学,语言好极了,结构巧极了,可以反复咀嚼。我们读《红楼梦》可以欣赏它的“言”,但它不止于“言”。此外,《红楼梦》的好处不光在于它所“言说”的“事”,而是这些叙事包蕴着的人情世态、人生境遇、人性层次。《红楼梦》的言是围绕着人情人性来的,这就是它的意。“意在言外”,需要体会。这种体会随读者知识水平、人生经历等等的变化而变化,故能常读常新。《红楼梦》的这种特质,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性”。文学性是评价雅文学的重要指标,而对俗文学,我们通常不这样要求。事实上,俗文学在文学性上表现出色的也很少(不能说绝对没有)。俗文学主要是“说事”,“事”之重要性远远超过“说”,而且往往是“言”尽“意”也尽。毋庸讳言,《三体》文学性是不佳的,这无损《三体》的魅力,大刘构思之宏

大非常人能及。这宏大想象以科学理论为依据,非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而有天马行空的无穷魅力,令人心潮起伏、脑洞大开,读起来很“爽”。但这种“爽”,是爽快之爽。《红楼梦》读着也“爽”,但是“爽”中带“酸”,带“苦”,带“悲”。若就阅读体验论,读《三体》和读武侠差不多。与其把《三体》和《红楼梦》对比,不如把它和武侠对比。武侠、言情、探案,科幻本就是俗文学最常见的类型。若拿《三体》和金庸武侠对比,也很难说它超越了金庸武侠,顶多只能说各有千秋。论想象力,大刘和金庸各有千秋,金庸在题材之宏大上或有不及,但论想象的细腻,怕有过之。若说论想象力的扎实性,二人也各有道行。虽然降龙十八掌、凌波微步之类武林绝技不合于物理学原理,但金庸是以宗教、历史、文学等学科上的知识做他想象世界的支点的。大刘则以科学知识为想象之支点。一本于人文,一本于科学,很难说这两种想象谁更高明。若论阅读快感,二者实不相伯仲,都是那种让你成天神经兮兮,沉湎其中的作品。要论影响力,至少到目前为止《三体》和金庸不是一个量级的——我想以后也

还是如此。从这一点上说,李淼说《三体》是“人民的‘神话’”,我倒觉得金庸更像一点,毕竟金庸拥有更多的“人民”,武侠也比科幻更像“神话”。虽然,我觉得大刘的“二向箔”打不过金庸的“六脉神剑”,不过,如果要做推荐书目,在二人中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我会推荐大刘。金庸,我所欲也;大刘,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金庸而取大刘者何。何以故?就因为它是科幻文学。科幻文学不代替我们打发时光,它还有两个重要的社会价值。首先是科普作用。好的科幻文学,莫不以人类已经取得的科学真理为根据展开想象,它也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这些科学成就。在科学素养严重不足,各类迷信还很有市场,“大师”辈出的时代,科幻文学岂不有一丝救世之功?其次,更重要的是,科幻文学是一种“未来之思”。作为“未来之思”,科幻文学是一种指引,人们不仅会在它的指引下想象未来,甚至某个被激发起好奇心的孩子长大后努力研究,把其中的一些幻想变为现实,这在科学发展史上并不少见——而“易筋经”“狗咬棒”是不可能引导人类去想象未来,更不可能促进科学进步的。

《曾侯乙编钟》新书首发

科技日报讯(记者杨雪)由30多位不同学科专家历时12年研究的最终成果《曾侯乙编钟》新书日前在京首发。该书从三十多年来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出发,对我国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铸造技术、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曾侯乙编钟》全面梳理了其有关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古文字学、声学、冶金

铸造学、科技史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涉及曾侯乙编钟的组合及其悬制、钟磬铭文的释读及其律学涵义、音响实测及分析、一种双音创造的证实及其声学原理、律制及其定律律、乐学体系、铸造及其复制等内容。该书全面反映了曾侯乙编钟的文化面貌及多学科研究成果,为目前曾侯乙编钟研究领域最全面详实的研究专著。